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出版

九編 21

# 台灣皇民化時期 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

以 1940 年代為中心

林嘉立 · 著



# 臺灣歷史與文化 研究 輯刊

九 編

第 21 冊

台灣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  
——以 1940 年代為中心

林 嘉 立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台灣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以 1940 年代  
為中心／林嘉立 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2016〔民 105〕

目 2+174 面；19×26 公分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九編：第 21 冊）

ISBN 978-986-404-489-4（精裝）

1. 臺灣文學史 2. 敘事文學 3. 日據時期

733.08

105001819

ISBN-978-986-404-489-4



臺灣歷史與文化研究輯刊

九 編 第二一冊

ISBN：978-986-404-489-4

## 台灣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 ——以 1940 年代為中心

作 者 林嘉立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 / 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mailto: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6 年 3 月

全書字數 166573 字

定 價 九編 24 冊（精裝）台幣 50,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台灣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

——以 1940 年代為中心

林嘉立 著

## 作者簡介

林嘉立，1985年生於嘉義市。台大中文系、政大台文所畢業。〈回應現代性的族群認同建構與原住民文學〉一文曾獲第八屆台灣文學研究生學術論文研討會評審獎；寫作方面曾獲台大賦思文學獎、政大道南文學獎、嘉義桃城文學獎。《史明口述史》（行人，2013）訪談小組成員。

## 提 要

民族主義敘事是台灣日治時期新文學很重要的一個表現。但台灣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在台灣文學史受到戰後民族主義浪潮的催發而展開的書寫過程中，經常因為「時空環境差異」以及其中內含「皇民文學」等看似親近日本殖民者的言論，而與民族道德相對正確的前行時代隔離開來。只是當我們明白歷史敘事、尤其是於民族主義滋養下進行的歷史敘事，經常為了證成當下身份意義的需求而導致了偏頗以及去脈絡化的結果，「皇民文學」或皇民化時期新文學中的民族主義敘事就有了重新閱讀的空間。本文以民族主義的理論爬梳為始，配合「東方式殖民主義」的概念，切入1930年代左翼思潮在地開花，以及1940年代的鄉土書寫、文學史建構與「皇民文學」等一系列台灣知識分子的文學活動，一方面以回應「東方式殖民主義」的假定，將日治時期台灣知識分子編入日本帝國的欲望連接回皇民化時期之前；另一方面則期望賦予被殖民的台灣人追求身份認同的過程以完整的意義。



# 目

# 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跨世紀的皇民文學論爭	4
第三節 戰後台灣的民族主義敘事之特徵	9
(一) 民族主義概述	10
(二) 台灣戰後民族主義敘事的情節架構： 雙重的二元對立	14
第四節 研究方法	19
第五節 研究範圍與章節安排	32
第二章 左翼思潮的在地化與 1930 年代台灣的 殖民地民族主義敘事	37
前言	37
第一節 殖民地民族主義敘事迂迴的進路（上）： 知識分子思想的遞變	39
(一) 1927 年台灣文化協會分裂的意義	40
(二) 鄉土文學／台灣話文論戰	44
第二節 殖民地民族主義敘事迂迴的進路（下）： 台灣文藝聯盟	50
(一) 「階級」與「民族」的互動	51
(二) 民族主義敘事的困境：「鄉土」的裂痕	56
第三節 1930 年代台灣小說創作中的民族主義 敘事	61
(一) 從「模擬」到「民族的階級」	62
(二) 「鄉土」空間的意義	67
小結	73
第三章 戰雲密布下的台灣殖民地民族主義敘事	75
前言	75
第一節 皇民化時期日本的「東方式殖民主義」	78
第二節 楊雲萍、黃得時的台灣文學相關論述與 民族主義敘事	88
(一) 楊雲萍與兩個海外移民後裔共同體的 敘事之爭	89
(二) 黃得時與台灣人共同體邊界的擴大	94

第三節 張文環小說創作中的「鄉土」與民族主義敘事	102
(一) 現代性的魅影與無法掙脫的傳統	104
(二) 批判現代性與回歸鄉土世界	108
小結	114
第四章 從鄉土書寫到皇民文學	117
前言	117
第一節 糞寫實主義論戰：美學假面下的政治鬥爭	120
第二節 〈道〉與〈奔流〉：如何成為日本人	129
(一) 孤獨的求「道」者	130
(二) 奔馳在時代潮流中的被殖民者	136
第三節 周金波與皇民化時期民族主義敘事的總結：鄉關何處	144
(一) 有光之處必有暗：周金波的「成為日本人」之道	144
(二) 「我們」真的能成為日本人嗎？	148
(三) 鄉關何處	152
小結	159
結論：一則「家」的寓言	163
參考資料	169
圖表次	
中國意識、台灣意識與日治時期的民族主義敘事的辯證	20
戰爭時期的台灣文壇大致分為蟄伏期、復甦期與消頹期等三階段表	80
「氣候、信仰和宿疾」三大敘事元素關係表	153
〈鄉愁〉全篇寓意具象化三角地圖	156
本論文的研究成果表	166

# 第一章 緒 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因為在狹窄的樓梯上無法兩個人並排走上去，所以我跟在他後面上樓。他的身材相當高，光線因此被遮得有點暗，我只好就著餘光，像數樓梯一樣，一步一步登上去。

就這樣慢慢地登上樓，倒覺得這樓梯還相當長。〔註1〕

這是周金波在日本實施「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前夕，於《文藝台灣》發表的小說〈志願兵〉的結局。身材相當高的人叫明貴，他剛從「血書志願」的好友進六家裡回來，遇上拿著早報想來通知他進六此一壯舉的姊夫（我、小說的敘事者）。明貴跟姊夫說他去向進六道歉，因為勇於「血書志願」的進六才真正是為台灣前途著想的人，自己日後要更加努力才是。講完這番話，小說就結束在明貴與姊夫一前一後後登上樓梯的「進行式」中——兩人看似往「有光」的地方拾級而上，但讀者無論如何也不知道他們究竟抵達目的地沒有、也不清楚他們爬上樓究竟是為了什麼？這個充滿隱喻的結局，在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後，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注意，反倒是小說中關於「如何成為日本人」的反覆辯證，招來「違背民族大義」的指責。

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或歷史記憶，在台灣 1945 年「回歸祖國」後「再中國化」的必然，以及隨後國民黨政府遷台的局面下，只能以旁支末節的身

---

〔註 1〕 周金波，〈志願兵〉，刊於《文藝台灣》第二卷第六號，1941 年 9 月 20 日，頁 21。

份被編進國民黨官方的抗日史或近代中國抵抗帝國主義的系譜中，無法全面展開後殖民式的檢討。直到1970年代，在國內外動盪局勢所催生的「回歸台灣現實」這股民族主義的情感潮流中，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或歷史記憶才得以重返舞台，原本被視為禁忌的皇民文學及其相關議題也同時被挖掘出土。不過當我們看到1979年由遠景出版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如何以葉石濤揭櫫的「台灣意識」、所謂「在台灣鄉土文學上所反映出來的，一定是『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經驗……而絕不是站在統治者意識上所寫出來的、背叛廣大人民意願的任何作品。」〔註2〕為編選的標準，強調「凡是皇民化意味甚濃的御用作品，以不選錄來隱示我們無言的、寬容的批判。」〔註3〕時，我們就能明白所謂「皇民文學」〔註4〕並不是像它那些親戚以「經典」的身份出土，而是被當成失去民族本位的負面教材或畸形的殖民地傷痕來看待。〔註5〕看似鼓吹台灣人為天皇上戰場的〈志願兵〉，自然無法出現在這套選集中，更沒有人來回答筆者對登樓的疑惑。

但是耗費大量人力物力的文學選集的編纂，往往暗示其與政治的親密關係。尤其當它被當成建構一套歷史認識論的工具時，編纂的動作除了意味著當代特殊的、某群人專屬的美學品味，也更可能是爭奪文壇發言位置以及解決當前認同問題的策略。也就是說，選集向讀者展示的已經不只是個別作品

〔註2〕 葉石濤，〈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總序〉，收於葉石濤、鍾肇政主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台北，遠景，1997），每冊卷首10~11。為求行文統一，本文將書名及句中所有「臺」字改為「台」，以下凡遇書名、篇名或徵引文句中有「臺」字，皆一併統一以「台」字，不再附註。

〔註3〕 張恆豪、林梵、羊子喬等，〈出版宗旨及編輯體例〉，出處同上，每冊卷首頁4。

〔註4〕 陳芳明曾經對這個稱謂提出異議，認為應該以「皇民化文學」這個表示「台灣處於被動的地位，在強勢霸權的趨使之下而不得不進行文學創作」的詞彙，取代暗示「台灣作家主動配合日本國策而從事文學創作」的「皇民文學」（陳芳明，《台灣新文學史》【台北，聯經，2011年】，頁158~159。）。本文認同陳芳明的說法，但鑒於皇民化時期的台灣文學場域，在談論這類表現出效忠天皇或自我身份認同掙扎的作品時，皆是以「皇民文學」一詞為準，因此下文仍沿用「皇民文學」此一詞彙。至於其中詳細的論證，因與日本官方民族主義的欲望有複雜的關係，本文將於第四章再行處理。

〔註5〕 身為《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編輯之一的鍾肇政，曾於《聯合報》副刊發表〈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盲點——對皇民文學的一個考察〉（1979年6月1日），文中雖然對某些知識分子不願意翻譯皇民文學的心態提出疑義，但鍾肇政並非想替皇民文學翻案，而是呼籲以正視事實的態度，將皇民文學編入殖民地「迫害者與受害者的歷史」中。

在「被書寫當下」的面貌，而是被削足適履地置入後設完整而連貫的架構之下、再現了「編選當下」的政治欲望。因此，編纂所依循的「篩選標準」並非像編纂者言之鑿鑿地擁有不可挑戰的權威——觀諸台灣「反共文學」當道時的《戰鬥文藝叢書》、《現代戰鬥文藝選集》等如今只聊備史料一格，應該是極端的例證。

本文研究動機，正是起自於對《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反帝、反封建」如此暗示道德正確性的「篩選標準」的質疑。雖然篩選標準以正氣凜然的姿態表現出對「皇民文學」的不屑，但卻必須承認它無法在敘述中安放、討論「皇民文學」——它對台灣人在認同上傾向日本的原因或過程沒有詳細討論的興趣，只以一個其實是當代發明、能夠滿足當代政治欲望的「篩選標準」直接評價結果。本文認為，〈志願兵〉真正讓讀者揣揣不安的，並非對日本帝國強烈的認同或明貴讚揚「血書志願」一處——這些明顯受殖民者牽動的表情，在後殖民情境中，都非常容易藉由「背叛者」的標籤將不安抹煞消除——而是周金波另外安排了登樓的「進行式」，讓讀者在延宕的氣氛中，感受到「血書志願」以及意志堅決的明貴等這些文本中原來偉岸的文字敘述，開始瀰漫著不確定性：如果台灣人真的認定自己是日本人，為什麼還要反覆辯證成為日本人的方法？又為什麼皇民化時期「成為日本人」等相關議題會如此吸引台灣人？這些問題都不是只以「反帝、反封建」的框架、強調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不可逾越的界線就能回答，而是必須將原本畸形的皇民文學重新編排進日治時期新文學中。本文的命題與此切身相關：皇民文學其實與日治時期前行的新文學一樣呈現了台灣被殖民者的精神世界，它們之間雖然因為面對殖民者的統治技藝、時空環境的差異而有不一樣的表情，但皆是回應日本特殊的殖民主義而發展的一套殖民地民族主義敘事（narrative）（註6）。貫串日治時期新文學的殖民地民族主義敘事，卻在戰後被區隔成光明與黑暗的二元對立。本文寫作的目的，即是欲將皇民文學的民族主義敘事從戰後的道德枷鎖中解放出來，將其重新置回日治時期新文學民族主義敘事中觀察，嘗試回答被殖民的台灣人何以有著成為日本人的欲望，以及他們如何思考身份認同、想像民族等種種問題。

〔註6〕關於「民族主義」、「敘事」或「日本特殊的殖民主義」等概念，本文擬於以下幾節再詳加說明。

## 第二節 跨世紀的皇民文學論爭

1970年代後台灣歷史記憶再度得到重視，如邱貴芬所言，是「因為台灣『抗日』的經驗被縫合到『中國性』的確認，呼應當時高漲的（中國）民族主義論述。」〔註7〕認同向日本帝國主義傾斜、與中國民族主義水火不容的皇民文學，本來就是必須排除的瑕疵品——前述《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的篩選標準正反映這般事實——但以呼應中國民族主義的姿態重返文化舞台的日治經驗，卻逐漸「勾勒出有別於中國文學史敘述的圖像，提供國族建構所需要的文化象徵，支援台灣民族主義的發展。」〔註8〕不但使得台獨議題在1980年代解嚴、國民黨官方的統制愈加鬆動之際浮上檯面，1997年的「《認識台灣》教科書風波」〔註9〕更意味著台灣本土意識有威脅中國民族主義之勢。在此情況下，原本被中國民族主義鑑定為「漢奸」的皇民文學，似乎有了不同解釋的可能性，自1998年開始台灣文壇針對皇民文學的意義展開規模性論爭，即為具體例證。〔註10〕

1998年底，以陳映真、呂正惠等人為編委的《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以下簡稱《叢刊》）發行了名為「台灣鄉土文學·皇民文學的清理與批判」的創刊號。從〈出刊報告〉中，我們得知這本介於雜誌和書籍形式的出版物，是

〔註7〕 邱貴芬，〈翻譯驅動力下的台灣文學生產〉，收於陳建忠等人合著，《台灣小說史論》（台北，麥田，2007年），頁242。

〔註8〕 出處同上，頁242。

〔註9〕 1997年6月至7月間的「《認識台灣》教科書風波」是觀察「台獨」如何在政壇與文化界成爲一個可公開辯論的話題。關於這場爭議的過程，可參考王甫昌，〈民族想像、族群意識與歷史——《認識台灣》教科書爭議風波的內容與脈絡分析〉，刊於《台灣史研究》第8卷第2期，2001年12月，頁145~207。

〔註10〕 其實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期，台灣文壇就已經歷一場皇民文學論爭，前註所徵引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編輯之一鍾肇政的意見，即為這次論爭的源頭。期間論者主要針對皇民文學、西川滿與楊遠的歷史定位等議題展開討論。關於「第一次」皇民文學論爭的過程，可參考賴婉玲，〈皇民文學論爭研究〉（中央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7年），頁48~86。本文將焦點集中在解嚴後的皇民文學論爭，是因為「第一次」皇民文學論爭中，引發爭議的主要是可否將皇民文學在台灣文學史的書寫中呈現出來、可否對寫作皇民文學的作者加以同情，而非關皇民文學的意義。此外，正如筆者正文所述，此時中國民族主義是主要參考的框架，論者對皇民文學的看法其實沒有太大的區別。因此，當解嚴之後台灣民族主義與中國民族主義逐漸能分庭抗禮時，皇民文學在不同態度與敘事形態中是否有「解構」的可能，應該更值得觀察。

欲針對「戰後民族分斷……反共獨裁下的資本主義發展、在美國制霸的世界秩序下的『現代化』……和本地資產階級『國家』政權的形成」〔註 11〕等現象做出回應與批判。這些揭櫫理念的詞彙，自然高擎以陳映真等人為首的「人間出版社」對身處帝國主義、資本主義下的弱勢族群一貫的關懷，但除此之外，我們更發現這種關懷或意識型態如何經由鄉土文學與皇民文學兩造看似互不相關的題材，開始推演一套文化戰術：一方面再次澄清他們原本所設定的反帝、反資本主義的鄉土文學理念，針對當下、亦即解嚴後台灣歷史情境加以解釋；另一方面則試圖將皇民化時期的殖民地記憶，納入反帝、反資本主義的鄉土文學理念下進行批判與清理，最後得以建構或鞏固（左派而非官方的）中國民族主義於文化場域中之位置。

《叢刊》這套戰術所針對者，其一是反共、親美的國民黨政府，其二則為當時以鄉土文學為契機，展開「台灣文學的『脫中國』性和歷史獨特性」〔註 12〕的台灣意識論者——事實上《叢刊》會以批判皇民文學的論辯姿態問世，正導因於 1998 年初，張良澤輯譯了 17 篇 1940 年代、他所認為的「皇民文學」短作，以「皇民文學作品拾遺」的名稱刊於各大副刊上，更於 2 月的《聯合報》副刊發表了〈正視台灣文學史上的難題——關於台灣「皇民文學作品拾遺」〉這篇導言性質的文章。張良澤在這篇文章中，反省自己過去在反共教育下痛批皇民文學是欠缺「將心比心」、「愛與同情」，而且「不知我自己走上的道路其實也是他們走過的旅程！」〔註 13〕雖然張良澤仍舊視皇民文學為道德上的錯誤、沒有替皇民文學翻案之意，但當國民黨政府的反共文藝政策被張良澤當成反省的觸媒，皇民文學就不只是因為愛與同情得以再現，而是指桑罵槐地被賦予了批判（官方）中國民族主義的力道，並開闢出台灣本土意識的生存空間。

張良澤和陳映真兩人在批判官方的立場上看似相去不遠，但陳映真「反反共」的目的來自於意識型態上的左傾、是欲以左派的中國民族主義挑戰國民黨版本的中國民族主義，自然無法苟同張良澤藏有台灣本土意識的言論，一場皇民文學論戰也於焉展開。同年 4 月，陳映真先於《聯合報》副刊發表

〔註 11〕 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編輯部，〈出刊報告〉，刊於《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清理與批判》，1998 年 12 月，頁 2。

〔註 12〕 出處同上，頁 1。

〔註 13〕 張良澤，〈正視台灣文學史上的難題——關於台灣「皇民文學作品拾遺」〉，刊於《聯合報》副刊，1998 年 2 月 10 日。

〈精神的荒廢——張良澤皇民文學論的批判〉以為抗衡，標舉賴和、楊逵等一脈相承的所謂「在作品中表現出磅礴堅強的、對民族和階級壓迫的抗議」〔註14〕之光榮傳統，而以「在集體性歇斯底里中幻想自己從『卑汙』的台灣人蛻化成光榮潔白的『天皇之赤子』」〔註15〕評價皇民文學，本於「民族大義」對張良澤愛與同情的態度加以駁斥。緊接著，年底《叢刊》的創刊特輯再將這篇文章轉載，當成「清理」的先鋒——這當然呈現了陳映真緊咬張良澤「皇民文學合理論」不放、延長戰線的企圖，但當這篇文章通過「特輯」的後製手法，以批判「美化日帝據台歷史……仇恨、憎恨中國和中國人而必欲將台灣從中國分裂出去的這些理論與行動」〔註16〕的類型歸檔，再與批判「台獨派文論（『本土文學』派）大張旗鼓、偷天換日，劫取鄉土文學論爭的果實而強奸之。」〔註17〕的鄉土文學理念相互縫合，它就不再只是一篇針對性的文章，而是如上文所述，協助建構出一套文化戰術。

陳映真與《叢刊》的戰鬥還沒完。1998年的這場「皇民文學論爭」要直到2003年陳映真批判日本學者藤井省三之後，才算告一段落。〔註18〕這次引發爭議的，是藤井台灣文學研究專書《台灣文學這一百年》〔註19〕中收錄的

〔註14〕 陳映真，〈精神的荒廢——張良澤皇民文學論的批判〉，刊於《聯合報》副刊，1998年4月2日～4日。在陳映真之後，彭歌與馬森也分別發表了〈醒悟吧！回應陳映真〈精神的荒廢〉一文〉（1998年4月22日）、〈愛國乎？愛族乎？「皇民文學」作者的自我撕裂〉（1998年4月27日）兩篇文章。彭歌雖然對陳映真「反反共」的態度不以為然，但他看待皇民文學的立場與陳映真雷同：「所謂『皇民文學』，是漢奸文學的一支，屬於歷史的渣滓，陳映真對皇民文學的申討，深得我心。」至於馬森，雖然他提出「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不一定有一致的必要，也試著理解走上皇民之路的作家們內心撕裂的痛楚，但馬森仍強調「『皇民文學』作家之認同日本軍國主義卻令人感到他們通過自我輕賤而高攀了大和民族」。由此觀之，雖然陳映真、彭歌、馬森等人的言論有所差異，但他們同樣對皇民文學持以批判的態度。

〔註15〕 出處同上。

〔註16〕 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編輯部，〈台灣皇民文學合理論的批判〉，刊於《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清理與批判》，頁4。

〔註17〕 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編輯部，〈鄉土文學論爭二十周年〉，出處同上，頁63。

〔註18〕 期間還包括《叢刊》針對垂水千惠《台灣的日本語文學》（台北，前衛，1998）中分析「皇民文學」的觀點、中島利郎於1998年「近代日本與台灣」研討會中的言論，而於1999年製作的特輯「不許新的台灣總督府『文奉會』復辟」；此外，2000年陳芳明與陳映真因書寫台灣文學史的史觀而引發爭議，其中兩人對「皇民文學」相左的意見也可視為「皇民文學論爭」的一支。這場論爭的詳細過程，同樣可參考賴婉玲，〈皇民文學論爭研究〉，頁100～127。

〔註19〕 藤井省三，《台灣文學 一百年》（東京，東方書店，1998年）。

〈「大東亞戰爭」時期的台灣皇民文學——讀書市場的成熟與台灣民族主義〉這篇文章。文中藤井將日治末期、主要是1937年之後，視為台灣讀書市場成熟的時期，而其結果一方面讓原本壽命短暫、發行量普遍不高的文藝雜誌業績大幅成長，促使「台灣文壇」漸成氣候；另一方面則透過日語作品的交流，營造出一個「公共領域」。這個因大東亞戰爭的推進而誕生的台灣文壇或公共領域，當然不可避免地向「文學報國」的皇民文學傾斜，但藤井以為，台灣人的皇民文學並非純粹宣傳戰鬥意志，而是將台灣人未曾有過的戰爭經驗加以論述化的產物，並在生產與閱讀的過程中意識到主體性，以皇民文學為核心，開始進行「台灣民族主義」的想像。（註20）

在這篇文章中，藤井主要以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公共領域」的概念，結合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民族主義」此一「想像的共同體」如何因印刷資本主義的興盛而誕生的論述，去建構他對台灣日治末期文學史的解釋。藤井甚至進一步將「民族主義」的解釋擴大到他對「台灣文學」的定義上。（註21）此處暫且不論藤井引用「公共領域」或「想像的共同體」等概念是否過於粗糙武斷，（註22）藤井強調日治時期台灣人如何因為因應殖民者的統制策略，而誕生了不同於中國民族主義（或無法純粹以中國民族主義收編）的敘事，其實與當時持台灣民族主義的論者大方向是一致的。（註23）

〔註20〕藤井省三著，張季琳譯，《台灣文學這一百年》（台北，麥田，2003年），頁45～79。

〔註21〕如藤井省三在〈序——何謂台灣文學〉所言：「無論是日語或北京語，只要該文本（text）是和台灣等身大的共同體意識，或和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的價值判斷有所關連，就可稱為台灣文學。而當某文本是用所謂的共同體意識，或民族主義的意識型態來閱讀時，也可將其定位於台灣文學的範疇內。」（出處同上，頁22）。

〔註22〕例如藤井忽視了此時台灣「公共領域」的形成與官方因應戰時的統制策略關係密切，而且這個台灣文壇的集結——至少在最初、在張文環等人的《台灣文學》集團成立前——是以日本文人為主體、是排斥台灣人參與甚至發言的文壇。另一方面，將台灣日治時期「公共領域」或「想像的共同體」之誕生繫年於四〇年代，更是無視於台灣於1930年代，已存在聯合陣線式的集結，以及因普羅文藝思潮影響，而出現以台灣為疆界的民族主義敘事等事實。

〔註23〕如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一書中，將台灣文學視為站在台灣立場、並懷抱台灣本土意識創作的文學，是相對於中國文學、有其自主性的文學，而這種台灣文學本土論正是於日治時期誕生。至於何以台灣會在日治時期發展出相對於中國的自主性？游勝冠的解釋之一與藤井相仿、強調了日語的重要性：「透過日文汲取多樣的養分，一方面勢必使台灣新文學作品呈現與中國新文學不同的風貌，一方面隨著視野擴大，作家是否還願意委屈自

但藤井與台灣民族主義者最大的差異，在於他將敏感的皇民文學，直接指認為「當代」台灣民族主義的血親。

2003年底，陳映真於《叢刊》發表〈警戒第二輪台灣「皇民文學」運動的圖謀——讀藤井省三《百年來的台灣文學》：批評的筆記（一）〉，直指藤井對父祖輩的帝國主義在東亞造成的戕害不但不加以反省，甚至還為漢奸的皇民文學「塗脂抹粉」、企圖將台灣文學從中國文學分裂出去。<sup>〔註24〕</sup>秉持中國民族意識的陳映真，相較於藤井強調日文、當時的「國語」，如何給予台灣人在公共領域或共同體想像的建構上莫大助益，陳文則不斷提醒讀者，在1937年之前，中國白話文早已承擔起台灣「殊方異語」的知識分子們交換意見、傳播思想的重責大任，而台灣人以中國白話文建構的公共領域或共同體想像，「恰恰是反日、抗日、以復歸祖國為願念的漢族共同體和漢民族主義意識，而不是什麼『台灣民族主義』和『台灣意識』。」<sup>〔註25〕</sup>陳映真的說法固然指出藤井的盲點，但我們可以發現，陳映真反對的並非藤井使用公共領域或民族主義等概念，陳映真與藤井（或者被陳映真視為為了主張台灣分離運動而「美化」日本殖民者的同路人）之間的對陣，反而呈現了雙方對「台灣近代的民族主義誕生於日治時期」這點看法一致，只是在鑑定這個民族主義想像的疆界或血統時致生齟齬。

總結這場「皇民文學論爭」，大致可有三點發現：首先，在陳映真與《叢刊》「（中國）民族主義」猛烈批判的砲火下，反而幫我們確認了「台灣意識／民族主義」這個認識論的他者之存在、確認這場論爭演繹的，其實是同樣誕生於1970年代本土化浪潮中帶有反官方文化霸權色彩的民族意識，如何逐漸裂變成「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兩個陣營，進而在解嚴後爭奪文化詮釋權的戲碼；其次，雖然雙方在解釋日治時期台灣的殖民地民族主義究竟是「祖國」的一支、還是孤兒自力奮鬥的成果時擦槍走火，但那是建

---

己的作品為中國新文學的支流，在日據下與中國隔離的現實中，實在頗值得懷疑。」（游勝冠，《台灣文學本土論的興起與發展》【台北，群學，2009年；原本為1996年前衛出版，但兩版本行文幾乎無差異】，頁39。）

〔註24〕 陳映真，〈警戒第二輪台灣「皇民文學」運動的圖謀——讀藤井省三《百年來的台灣文學》：批評的筆記（一）〉刊於《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告別革命文學？》，2003年12月，頁143～161。陳映真這篇文章發表時，藤井專書的台灣版尚未上市，陳映真是根據原文加以抨擊。也因此藤井得以在台灣版中，附加一篇〈回應陳映真對拙著《台灣文學這一百年》之毀謗中傷〉的文字。

〔註25〕 出處同上，頁149。

立在日治時期「台灣已存在民族主義」的共識上，而且這個「過去的」民族主義必然是「現在的」民族主義的直系父母；最後，「台灣意識／本土意識」的擁護者意圖將皇民文學重新排入台灣文學史，看似讓皇民文學有了新的可能，但其實皇民文學只是得到從中國民族主義的「漢奸」定義中解構的可能、只是被當成解構當代文化霸權或文學典律的策略，它最後的命運仍是以畸形傷痕的型態，成就一部被迫害的悲情台灣史。（註26）

### 第三節 戰後台灣的民族主義敘事之特徵

從上節的敘述中，我們得知日治時期的台灣新文學與歷史記憶，分別在1970年代和1990年代受到極大的重視，但理解方式有所差異：1970年代是將其收編在中國民族主義的敘事中；1990年代開始，則出現以台灣民族主義的敘事為替代方案。但不論他們想從日治時期尋找中國性還是台灣性，我們皆能將雙方視為江宜樺所謂以「民族主義」的立場，去思考、回答當前國家認同問題的社群。（註27）只是這些一再被指稱為（或者自己標舉）以「民族主義」的立場，對日治時期進行敘事的前行研究，究竟擁有什麼樣「民族主

〔註26〕 附加說明兩點：首先，在藤井的論述中，皇民文學算是真的被「翻案」了，但正如前述，藤井與當時持台灣民族主義或台灣意識之論者雖然大方向上看似一致，但藤井的結論根本無法被接受，更不能代表當時台灣文壇對皇民文學的評價；其次，作為本文判斷「皇民文學論爭」的例證，可參考由張良澤指導的研究生王郁雯於「皇民文學論爭」方興未艾之際寫就的論文，〈台灣作家的「皇民文學」（認同文學）之探討——以陳火泉、周金波的小說為研究中心〉（台北，中國文化大學日本研究所碩士論文，1999年）。這本論文反映了當時以台灣意識反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大多數論者們共同的意念：以新歷史主義的策略突破文化霸權或既有的文學典律、進而建構台灣本土的歷史或文學觀。而重新對皇民文學進行敘述，其目的之一就是「破除統治者單一敘述的長期印記與外來強勢意識型態的干預」（王郁雯，〈台灣作家的「皇民文學」（認同文學）之探討〉，頁19）。

〔註27〕 江宜樺針對當時（1998年）台灣各種「國家認同思考方式」做出分析，除了「民族主義」之外尚有「自由主義」以及各種「激進（基進）主義」的立場。前者強調「憲政制度或公民權利才是決定一個人國家認同選擇的要件」，後者則因為「不滿國家認同被提升至如此重要的地位……統獨皆不能改變邊緣族群被剝削宰制的命運」而發聲。這兩種思考方式和本文欲處理的問題較無相關，故只援用「民族主義」的分類，並非指稱台灣只存在以民族主義這個系統思考國家認同。參見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1998年），頁137～188。

義」的特質？或者說，日治時期新文學或歷史記憶在「民族主義敘事」的詮釋下，會以什麼樣的面貌呈現？本節將針對這個問題，試著做出理論性的回答。

### （一）民族主義概述

民族主義（Nationalism）是從西方的語境中翻譯過來的詞彙，〔註 28〕至今對其本質或定義，學界仍莫衷於是，本文的興趣也非關民族主義「是什麼」的答案，更不是想回顧論述民族主義的學術史，只是希望能從民族主義的種種特徵中，大致整理出可用的架構，用以分析戰後台灣的民族主義敘事。提供指南的是以下三本著作：葛爾納（Ernest Gellner）《國族與國族主義》、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民族與民族主義》以及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佈》。

對近年民族主義研究之走向有著重大影響的葛爾納，其論述是從這個經典命題出發的：

民族主義基本上是一項政治原則，主張政治與民族的組成單元，兩者必須等同一致……是一套關於政權正當性的理論。〔註 29〕

而民族主義何以擁有這種原則，與近代工業社會興起後，需要一套能夠擔負起教授普遍明確且意義分明的溝通系統（標準化的書寫文字、口語）、亦即所謂「高級文化」的教育制度——「通才教育」有關。傳統親族或地方團體這些舊社會的分支，沒有能力與資源去負擔這種形式的教育，只有「近代國家」這個龐大機器能夠予以提供並保護之，這不但造成國家集權的現象，個人更從傳統社群中被吸納進一個與國家、與同質且普遍的高級文化更為緊密的網絡中。民族主義的年代，就在集權的近代國家興起，並與文化緊密結合的情況下得以實現。〔註 30〕因此，對葛爾納來說，「民族」並非像民族主義者宣稱

〔註 28〕 在台灣亦有將 Nationalism 譯為「國族主義」，以強調其與國家體制之間的辯證關係。本文採「民族主義」一詞，是以為「國族主義」一詞對國家體制的強調，會偏向與國家政策強烈塑造並要求人民效忠、上對下的「官方民族主義」或「愛國主義」之詮釋，而「民族主義」本文以為較能概括 Nationalism 的整體。

〔註 29〕 艾尼斯特·葛爾納著，李金梅、黃俊龍譯，《國族與國族主義》（台北，聯經，2001年），頁 1~2。

〔註 30〕 出處同上，頁 27~51。